

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翻譯挑戰與策略： 以《臺北人》和《藍彩霞的春天》日譯本為 研究對象

廖詩文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日文化間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翻譯挑戰，並提出相應的翻譯策略。透過分析《臺北人》和《藍彩霞的春天》的日譯本，我們發現語言文化的差異和目標語社會的法律規範對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翻譯造成了一定的限制。譯者無法僅依賴「忠實原則」進行翻譯，而需綜合考慮目標語的文化語境和讀者需求，透過「改寫」來創造接近原文的效果。此外，我們發現日譯本常用「クソ」等詞來取代原文的罵詈語或詈辱語，並透過創詞標音、創詞加注等方式來因應。譯者在跨文化語境中翻譯辱罵語時面臨許多限制，但可以透過理解原著，運用翻譯技巧和目標語文化中的情境詞彙來進行語言轉換，以實現異文化語境的仿造，解決目標語言中的欠額問題，並實踐跨文化溝通的目的。本研究期望能透過翻譯實務的分析和綜整，為中日翻譯研究的推進做出貢獻。

關鍵詞：辱罵語、跨文化翻譯、臺灣現代主義作家、翻譯策略和技巧、文化翻譯

收件：2023年7月31日

修改：2024年1月3日、2024年7月1日、2024年7月8日

接受：2024年6月26日編輯會決議刊登、2024年7月9日主編通過修訂稿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Translating Profanity: A Study o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Taipei People* and *The Spring of Lan Caixia*

Shihwen Liao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complexities of translating profanit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proposing relevant strategies. By analyzing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Taipei People* and *The Spring of Lan Caixia*, we identified cultur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impact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ranslators, rather than adhering strictly to the “principle of fidelity,” must consider the cultural milieu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reader needs, and creatively “rewrite” to emulate the original profanity effect. We observed that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ten substitute original profanity with terms like “クソ” and employ strategies such as phonetic notation. Despite facing numerous cross-cultural constraints, translators can leverag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translation skills, and target language’s situational vocabulary to achieve cultural mimicry, address lexical deficits, and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advance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research through practical translatio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Keywords: profanity,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Taiwanese modernist write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cultural translation

Received: July 31, 2023

Revised: January 3, 2024; July 1, 2024; July 8, 2024

Accepted: June 26, 2024 (Accepted by Editorial Board); July 9, 2024 (Editor-in-Chief Accepted the Revised Manuscript)

壹、前言

翻譯學上常以翻譯是否忠實作為評價譯本成功與否的標準之一。所謂的「忠實原則」(principle of fidelity)又稱為「信原則」(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是要求譯者於翻譯時盡可能忠實傳達原文信息，準確再現原文語義、風格和文化內涵的翻譯準則。忠實原則在翻譯學轉進「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1980、1990年代之後，就陸續受到許多學者質疑，例如，Venuti (2008)便批評了將原文視為翻譯「主人」的觀點，提出了「歸化／內化」和「異化／外化」的概念，並主張譯者須重視目標語的文化特性，但也應盡量保留原文的異國風情，使譯文既可服膺目標語的規範，但仍可為讀者帶來文化新訊與挑戰。Lefevere (1992)提出的看法是，翻譯是一種「重寫」活動，會受到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忠實原則往往忽視社會文化方面的因素，使得譯者的創造性受到限制。Toury (1995)也指出，翻譯應該要依循目標語的規範和讀者的期待，不應過分依賴原文，這觀點更直接挑戰了忠實原則的核心。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學派的翻譯學者雖然提出各種新式觀點，但他們並非完全否定翻譯的忠實原則，而是提醒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應該考慮更多文化語境的差別及不同讀者的需求，在需要進行適當「改寫」的地方有所著墨，以便讓目標語讀者能夠了解源語文本所要呈現的作品特色及旨趣，達成文學傳播或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九八〇年代之後，Bassnett (1980)等文化學派的翻譯學者，從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視角進行翻譯的研究，帶動了往後翻譯史、翻譯的權力關係，以及譯者現身等議題的研究風潮。此後，學界紛紛對翻譯在特定文化中的形成、變異、傳播、接受等層面發生興趣，積極探討翻譯對文化意識的牽動議題。翻譯文化學派長期關注翻譯生產、翻譯傳播、翻譯影響，重新定義了原文和譯文的主客地位，使我們更加認識了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文化取向的研究角度卻存在某些研究盲區，亦即容易忽視譯者的翻譯策略，以及其所信守的翻譯原則，對於譯本的評價力道也較為薄弱。

譯者如果能從語言與修辭的角度做到譯文與原文對應，便有機會再現原著的文學形象。許鈞（2012）曾說，再現文學形象的方法就是「譯者通過相應的手段，將原文所創造的形象在譯文中重新表現出來」（頁 111）。換言之，文學形象是否能被翻譯成功，一方面取決於譯入語和譯出語之間是否存在語言和思維上的共性，另一方面則需考慮目標語讀者是否能接受譯文對原文形象的表達方法（頁 112）。

然而，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觀與審美，文化的獨特性往往難以在另一文化中找到與其匹敵的共性，而這也成為譯者再現文學形象時的阻力。易言之，異國文化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就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挑戰。

小說家往往會以各種特色詞彙、句式、音節，形塑角色的性格和文學形象。譯者在處理這些特色詞彙或句式時，就必須特別留意話語在某種文化語境下的意義。例如，中文讀者與法文讀者對「蘭花」的文學意象就有不同的概念，中文讀者認為蘭花高潔清雅，法文讀者則視蘭花為「邪惡之花」（許鈞，2012，頁 113），因此若以蘭花比喻人品，中法讀者顯然會有不同的聯想。

臺灣現代主義小說中，有些作品運用了大量罵詞和粗鄙語來表達作家的文學意圖。例如，《臺北人》（白先勇，2002）與《藍彩霞的春天》（李喬，1997）就是這類型的代表作品。儘管兩部作品的作者成長背景完全不同，但他們在這兩部作品中，皆透過大量的罵詞和粗鄙語來刻畫角色和情境，表達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觀察與批判。這些文學作品透過粗鄙語的使用，不僅強化了小說人物的情感表達，也反映了社會權力的不平等和性別政治的複雜性。

在這些作品中，罵詈語（*vulgar language*）或詈辱語（*insulting language*）常以男性／女性、強／弱差異來隱涉政治和權力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揭示了語言使用與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之間的緊密聯繫。因此，研究這些作品中的罵詈語和詈辱語，對於理解語言行為背後的社會和文化動因具有重要意義。已知研究顯示，男性角色與髒話使用之間存在複雜的社會身分、性別刻板印象和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例如，Ningrum et al.（2022）、Hashamdar 與 Rafi（2018）的研究發現，男性在憤怒情緒下使用髒話的傾向較女性顯著，且這

種行為會受到發話者的社會身分和教育水平的影響。Markina (2020) 的研究指出，罵詞用語會強化父權體制下的性別刻板印象。由此可見，罵詈語和詈辱語的使用是一種受多種因素影響的複雜語言行為，包括性別、社會身分和文化規範等因素。

罵詈語和詈辱語雖在人類語言行為中常見，但由於其難以被讀者接受，因此不常見於文學作品中。然而，戰後臺灣作家的小說作品中，卻有一些如前所述的現代主義小說，內容充斥各種辱罵語 (profanity)，這些作家透過辱罵詞來形塑小說人物，藉此建構具有政治隱喻的文學世界。臺灣現代主義作家中，包括王文興、白先勇、李昂、李喬等人，皆曾大量運用罵詈語和詈辱語來表達其文學意圖。李昂的《殺夫》(李昂, 1983) 和王文興的《背海的人》(王文興, 1981) 都曾因作品中出現辱罵詞而受攻訐，其中《背海的人》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時，甚至因使用粗鄙語冒犯了中產階級的主要讀者而被迫停載(張誦聖, 2015, 頁 76)。對此，張誦聖(2015)表示，這些現代主義作家的審美標準有別於「傳統講究詞藻華美、帶有愛國傷感情懷的」前輩作家，他們更著重於處理「『實現個人價值』與『傳統倫理規範』之間的衝突」(頁 75)。因此，這些作家在語言上敢於使用「壞」的語言和「粗鄙」的詞彙，這些充斥辱罵語的作品不僅不應被貶低，反而應受到更多關注。現代主義小說中的粗鄙語在精英主義的寫作策略下，具有特殊的文學功能，成為作家反抗傳統、強調自覺的一種寫作手法。因此，在翻譯這些作品時，譯者需要注意這些罵詈語和詈辱語在文學作品中的作用，並在譯本中「忠實」再現其效果。

儘管《殺夫》和《背海的人》也包含大量的辱罵語，但這兩部作品中的罵詞主要集中在特定情節和人物衝突中。相比之下，《臺北人》和《藍彩霞的春天》中的罵詈語和詈辱語使用更為多元，更適合作為中日罵詈語和詈辱語翻譯研究的文本，能更好地理解辱罵語在不同語境下面臨的翻譯挑戰和策略。此外，這兩部作品涵蓋了臺灣社會中本省人與外省人常用的方言詈語。

《臺北人》中有兩岸異鄉人的方言俗語和罵詞，《藍彩霞的春天》則有較多

本土方言的性描寫和詈辱語。因此，研究這些作品的日譯本，探討譯者如何處理這些罵詞，對翻譯原則與方法的借鑒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是《臺北人》還是《藍彩霞的春天》，這些作品都透過使用辱罵詞來呈現作家刻意打破美文書寫，營造出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共存的文學世界。

為了進一步闡述此議題，本研究將從中文罵詈語和詈辱語翻譯成日文的過程中，探討譯者採取的翻譯策略與方法，深入分析他們處理詈罵詞彙時所遵循的對應原則。目的在於探討這些譯詞在目標文化中傳遞的文化訊息和被賦予的文化價值，從而為中日翻譯研究領域提供些許見解與貢獻。然而，該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侷限性，尤其是在宏觀分析特定譯者的翻譯特徵時遭遇到的困難。鑒於文字篇幅限制，關於罵詈語和詈辱語在文學作品中的文化意象與文學概念的深層比較與研究，將於其他研究論文中進行詳細探討。以下將先概述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研究現狀，並進一步說明中日文化差異，探討這些語言在中日翻譯語境中的翻譯挑戰與現象。

貳、辱罵語的相關研究及其於翻譯時文學形象再現上的挑戰

在探討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翻譯議題之前，首先需要確立這兩類語言表達在文學脈絡中的定義。這不僅為後續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能使我們從客觀的角度對涉及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翻譯進行成效評估。不同文化中的「罵詈語」和「詈辱語」在不同語境中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或意涵。特別是具有不敬、冒犯、粗俗、褻瀆或不雅意涵的「辱罵語」，往往涵蓋了粗俗的「罵詈語」和帶有強烈挑釁及侮辱意味的「詈辱語」，這些語言通常不被中產階層接受。因此，當罵詈語或詈辱語出現在以中產階層為目標讀者的文學作品中時，通常具有特殊的文學作用。辱罵語原本就是深受文化影響的言語行為，因此譯者需要了解作者的意圖及作品中角色的文學形象，才能在目標文本中重新創造出具有對等文學風格與效果的語言表達。

罵詈語和詈辱語在日常語言中經常被混用，但二者之間仍存在一些差異（韋津利，2004 / 2006）。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具有攻擊性和負面情緒，並且都屬於社會禁忌的話語。然而，罵詈語更側重粗俗和不雅的髒話或下流語言，而詈辱語則更側重於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或貶低的話語。詈辱語不一定是粗俗的，但往往具有侮辱性和貶低性。從語言目的來看，罵詈語主要用於表達說話者的情感發洩，不一定針對特定對象，而詈辱語則具有侮辱或貶低特定對象的目的，意圖令對方感到羞辱或難堪。舉例來說，「幹伊娘」、「娘個冬采」等等的詞語是說話者意圖表達憤怒和不滿的粗話，屬於罵詈語；而「你這個王八羔子」、「你敢開自家店裡的臭雞歪」等語句，則是直接攻擊他人或帶有明顯的物化和貶低意味的話語，屬於詈辱語。誠如前述，罵詈語和詈辱語都是具有攻擊性、負面情感且屬於社會禁忌的話語。儘管兩者之間存在微小的差異，它們都不適合在正式和禮貌的場合中使用。因此，當文學家在作品中使用這些語言時，必然具有特定的寫作目的。這些話語在翻譯成異國語言時，則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兩部作品中的罵詈語和詈辱語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以探討其在翻譯過程中的處理方式和效果。

透過對罵詈語和詈辱語文學意義的明確界定，不僅提升了其可譯性，也為我們提供了分析譯者策略、創意及技巧的窗口。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探討譯者如何執行整個翻譯專案（translation project），包括他們在「民族主義的翻譯與超譯（模仿、改編、自由重寫）」（Berman, 1985/2000, p. 286）之間的選擇。此外，我們還能揭示譯者如何理解原文的文學語境、如何適當運用母語，以及他們對原作的解讀和態度。

由於罵詈語和詈辱語承載了特定文化及民族對於咒罵和汙辱他人的觀念與思維模式，不同的國家和群體在罵詈語和詈辱語的使用程度及形式上存在顯著差異。根據早期語言學的研究，俄語、法語、義大利語和德語等被視為富於表達情感的語言，原因在於這些語言中含有豐富的咒罵詞彙。相比之下，日語、愛斯基摩語、馬來語、印地安語和波利尼西亞語等，則被認為在罵詈

語或詈辱語的豐富度上有所欠缺 (Hughes, 1998; Montagu, 2001)。這種語言間的差異不僅反映了文化差異，也對翻譯工作帶來了挑戰。在面對這些差異較大的情況時，譯者必須在翻譯過程中靈活應對，以克服翻譯的難度，確保原文的情感和意圖得以準確傳達。

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也深刻反映了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徵。在不同的語言體系中，話語可以是積極讚美的，也可能是負面批評的；同一句話在不同社會階層間的語言習慣下，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寓意，甚至帶有嘲諷的色彩。根據 Andersson 與 Trudgill (1990) 在《壞語言》(*Bad Language*) 一書中的研究，一般社會將粗魯、冒犯、褻瀆和淫穢的語言視為「壞語言」。然而，社會階層、性別、年齡等因素均會影響人們對於這些壞語言的感知。這些語言的使用不僅反映了語言文化的變遷，也體現了政治、性別、權力和社會階級的動態變化。如 Andersson 與 Trudgill (1990) 所述，雖然壞語言具有固定的語法規則，但其實際適用性卻依賴於語境和使用者的目的。在適當的文化社會共識下，這些壞語言便能有效地發揮其特有的表達效果 (pp. 61-62)。

在翻譯這類壞語言時，譯者面對的主要挑戰包括考量目標語言讀者的文化身分、社會法律規範以及語言發話者的原意。因此，翻譯策略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尋找目標語中的等效詞彙，以重現原語的語義和風格；二是當目標語中缺乏直接對應的詞彙時，譯者可以選擇與原文具有文化共性的類似表達方式，透過轉化或改寫創造與原文相似的語境效果，使讀者能夠體會到作者欲傳達的情感和意圖，從而達到翻譯應有的跨文化溝通效果。

關於罵詈語和詈辱語在文學中的功能，已有研究從荷馬 (Homer) 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600 年的作品《伊利亞德》(*The Iliad*) 進行討論。Montagu (2001) 表示，荷馬《伊利亞德》中的男性英雄形象是善於咒罵的，他認為這一文學形象的創造，是建基於希臘自古就有士兵及水手的歷史背景，因此《伊利亞德》中罵敵無數的英雄角色是在表達英雄「受困精神」的舒緩 (韋津利, 2004 / 2006, 頁 174)。與之相對，臺灣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

包括《臺北人》、《殺夫》以及《藍彩霞的春天》等，開口辱罵的角色皆是以咒罵作為「壓迫」弱者或抒發嗔怨的手段。相較於希臘英雄於「戰鬥」時說粗話，臺灣小說的咒罵語則多出現在強凌弱／男欺女的「侮辱」場景，那些令人不忍卒睹的罵詞，恰似作家用來營造文學氛圍，意圖讓讀者直面語言暴力、性別壓迫、政治壓迫、歧視傷害的工具。

咒罵原是人类語言行為中約定俗成、照章應卯的行為，但 Goffman (1981) 在其研究中卻指出，現代社會常視咒罵為「社會活動的落塵，空洞而無足輕重」(p. 90)，這也導致咒罵語的研究書籍或論文數量遠遠不如其他語言議題。對此研究上的稀缺，Kidman (1993) 則認為學術界不該長期閃避咒罵語的研究。現實生活中，中產階級總是對髒話敬而遠之，道德論者認為說髒話是社會問題，把說粗話的人視為是缺乏自制力的族群 (Phillips, 2002, 轉引自韋津利, 2004 / 2006, 頁 24—25)；另一派的人則認為，辱罵語的頻繁出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是後現代主義帶來的結果 (韋津利, 2004 / 2006)。由上可知，辱罵語在文學中的出現可說是社會朝向大眾化發展下的產物，因此以庶民生活為描寫場景的臺灣現代主義小說，在塑造庶民生活、形塑角色個性、創造作品氛圍時，便能常見罵詈語和詈辱語在作品中的慣常使用。這也意味，在翻譯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時，譯者不能忽視罵詈語和詈辱語在文學作品中用來形塑文學特色與角色形象的作用。

一般而言，在文明社會中，罵詈語和詈辱語是社會的普遍性禁忌，在實際生活中應該慨然迴避或予以禁止，然而翻譯家卻必須將原語文化中的罵詞詈語等信息轉換為目的語，讓目標讀者有效理解作家想要傳達的文學氛圍；如果目標語中缺少等義的辭彙，譯者還需透過轉換等翻譯技巧來傳達，而譯者站在兩種不同的辱罵文化之間所作的努力，就是在促成讀者能在文化語境上理解原著的意涵。為此，在跨文化翻譯中，譯者需要深入了解來源語言 (source language) 和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 所屬的文化知識、語言習慣、文化背景和社會慣習，以確保翻譯的準確性和適切性。

目前為止，進行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研究者，大多是以對比分析的方法探

討辱罵語在目標語文上被如何處理，然而這種研究方法雖能整理出不同譯本、不同譯者的翻譯特色，卻難以歸結出具體的應用方法。譯者必須在目標語文化中將罵詞「譯」出，不能忽略罵詞在原語文化語境中具有的語言功能，如此才能據以作為探討譯者是否適切「再現」（represent）原作中被刻意營造的粗話氛圍，進而作為評估其翻譯思維的基礎。

此外，除了探討罵詈語和詈辱語在譯入語文化中可能遇到對等詞欠額的問題之外，譯者還可能因某一時期的法律規範而不被允許譯出該詞語。即便可以直接譯出罵詈語或詈辱語，譯者也需再三思考譯詞是否能表現出原作中刻意營造的文學氣氛。舉例來說，《藍彩霞的春天》被視為是臺灣文學中第一部正面描寫雛妓生活的作品，裡面使用了多種性猥褻的字眼來彰顯雛妓生態的不堪，更有許多對白嵌入了文明社會中不見容的粗鄙語，但這些詈辱語是描繪雛妓底層世界與被壓迫的生態的手段，是作家透過語言暴力的形塑來表達弱者更須起而反抗、打破受迫生活的方法（李喬，1997）。

以頻繁出現在《藍彩霞的春天》中的「開苞／開包」一詞為例，這在雛妓文化中常聽到的語彙，是帶有強烈負面意涵的詞語，形容對一個未成年或未有過性經驗的女性進行性行為，具有明顯物化和貶低意味。這類詞語特別常見於涉及未成年或性交易的語境之中，帶有強烈物化女性和性剝削的意味。使用這個詞語時，對象往往被貶低為某種商品或物品，人性尊嚴被無情剝奪，因此像「開苞／開包」這類帶有強烈侮辱和物化意義但不一定是粗俗的語言，由於其強烈的攻擊性和貶低性，屬於本研究一併分析討論的詈辱語的範疇。

參、《臺北人》與《藍彩霞的春天》中罵詈語和詈辱語的處理及探討

我們從過去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研究回顧中可知，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辱罵語特徵各有不同。尤其是華人社會充斥各種方言詈語，要在不同語言中再現異地鄉土的罵詞，除了語言對等的問題需要考量之外，還要思考方言使

用的問題，比如把上海話翻成日本東北腔是否合適等等的提問就值得省思。此外，華人社會重視血脈關係，因此罵詞中有許多汗辱他人血統的語彙，比如白先勇《臺北人》系列故事中就有許多方言詈語都和血統汗辱有關，如「野種」、「王八羔子」、「幹你老母雞歪」、「媽的」、「野女人」、「死丫頭」、「孽種」、「婊子」、「幹伊娘」、「娼婦」、「娘個冬采」、「妖孽」、「婆娘」、「龜兒子」、「天殺的」、「偏他娘的」、「癩三」等，其中還有許多詞彙是透過貶低女性來達成侮辱他人的罵詞。

除了《臺北人》外，出版於 1980 年代的《藍彩霞的春天》也出現許多男性角色對女性角色施加語言暴力的情節，呈現出一種「權力」和「壓迫」的共性：文學作品中的男性角色被描繪為權力者，女性角色被描繪為受壓迫者。同時，這些作品也反映了臺灣社會中男人比女人更常出口咒罵的情況，呼應了前述 Ningrum et al. (2022)、Hashamdar 與 Rafi (2018) 的研究發現。

眾所周知，日語語法中有一種「敬語」形式，這種形式長久以來就是日語用來表達禮貌、維持人際關係的方法。日文的社交語言多以敬語進行人與人間的交流，因此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日語沒有罵詈語的存在。實際上，日語仍有許多字詞呼應其他比較含蓄、比較隱晦的咒罵表現。¹

根據韋津利 (2004 / 2006) 的研究，某些語言和文化有較多「性和排泄物」的粗話，這兩者「既可單獨使用，也可以加在一起達到更強的效果」（頁 253），而且以性語辱罵女性的粗鄙語，也有侷限於女性「被認知的性別角色和生理功能」（頁 253）的特徵，也就是常以女性性徵或生殖器官作為罵詈語。但是，「性」在日本語言與文化中卻較不帶汗名性 (Seward, 1992, p. 27)，這是日本語言特徵中較為獨特之處，再加上日本社會普遍迴避「性語」的使用，因此被用來作為辱罵詞的日語（性語）相對較少。日本比較語言學家中島利一郎 (1967) 在《卑語の起源》中指出，日本古典文學中的性語和卑語，與朝鮮語、滿州語、蒙古語等等的語源較為相近，而日本的性語很少被用在

¹ 從真田信治、友定賢治 (2011) 以及奧山益朗 (2017) 的作品來看，日本還是存在許多罵詈語。

咒罵上，甚至還與「錢」、「黃金」、「價值」等正向概念連結，例如日文裡的「金玉」（中文語意：黃金翠丸）就是一例（中島利一郎，1967，頁245—246）。比較之下，日本古典文學中提到性器官、性活動的詞彙大多是用在指示事物本身，而中文作品卻常把性語當作詈辱語使用。中日這兩種語言對性語有著概念上的差異，這是我們未來在檢視中譯日的詈罵語和詈辱語的翻譯時必須詳加注意之處。

不過，除了使用辱罵語表達負面情感之外，日語還可以僅從打破語言的內部邏輯、透過語調的上揚或下降等「失態的語言」來蔑視與侮辱對方，譯者也可採用這種寫作的手法，作為翻譯辱罵詞的一種「技巧」。易言之，如果採用文化學派的翻譯視角來考慮跨文化語境的翻譯問題的話，譯者就有更多展現創意與翻譯技巧的空間，好為目標語讀者傳達文學情境與作家意圖。

略知日語特徵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在社交語言上習慣以敬語形式維持和保護人際間的禮貌，而這也意味日本文化是把「無禮的言語行為」視為一種文化禁忌（韋津利，2004 / 2006，頁270）。比如，說話者如果在一些字句的「語氣」上加上強烈的情緒，也會在日語內部語言邏輯中變成極具「汗辱性」的句子，尤其是發話者以「冰冷、平板、直接」的方式表達時更是如此，舉例來說，「きさま、最低な男だよね」這句話中的「きさま」一詞，在日文內部語言邏輯上是極具挑釁或羞辱對方意向的「敬稱」，這個詞是從帶有高度尊敬意味的後綴詞「さま」衍生出來的辱罵詞，類似「您這位可敬的先生」，而「最低な男だよね」雖不帶髒字，但在日語內部語言邏輯中則意指「你這人可真是卑鄙」、「您，先生，是個無恥之徒」（韋津利，2004 / 2006，頁270—275）。只要有完整的情境，日語就能以繁複的前後文、前綴詞與後綴詞連用的「敬稱系統」來表達羞辱或憤怒，在其內部的語言邏輯中產生強大的辱罵力。換言之，日文辱罵語的數量雖然相較於中文少，但仍可運用「失禮的日語表達」來呈現汗辱性與禁忌效果。因此，譯者如果能夠掌握辱罵語或日文內部邏輯的寫作方式，便能有更多翻譯咒罵場景的翻譯方法可以運用。

辱罵詞的研究近來引起學術界許多關注，有些學者針對辱罵詞的功能進行了詳細的探討。比如 Bączkowska 與 Gromann (2023)、Holgate et al. (2018) 分別對髒話的功能進行了詳細的學術分析。Bączkowska 與 Gromann (2023) 提出了髒話功能的分類，包括社交聯繫、戲謔和表達憤怒等，而 Holgate et al. (2018) 則構建了一個用於預測髒話意圖的資料集和模型，並識別了六種類別的髒話使用情境，其中包括攻擊性和群體身分信號。Skliar (2020) 則探討了髒話中的攻擊性類別，強調其在表達攻擊性、緩解情緒壓力以及設定社會距離方面的作用。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罵詈語在語言使用中的多重功能性及其複雜性。

在中日文化間，如 Bączkowska 與 Gromann (2023) 提及的「社交」性咒罵詞常出現在同儕對話間，大眾戲劇中也時被使用，這些咒罵詞多以接頭詞、接尾語等形容詞或副詞的形式呈現，偶爾會以名詞或動詞的形式作為對話起始的發語詞。例如，在中文語境中，年輕人間的社交對話常以「幹！」或「媽的！」作為起頭語，有時這種咒罵情境只是為了拉近與聽話者間的親疏關係，或意圖營造出夥伴感，並沒有針對特定對象發起攻擊（韋津利，2004 / 2006；Holmes et al., 1996）。這種型態的罵詈語所表現的效能，即為 Bączkowska 與 Gromann (2023) 所稱的社交聯繫功能。相較之下，日本的文化語境中也有相似的用法，如「クソ！」、「てめえ！」等皆然。由於中日文化中都有社交功能的罵詈語，用法也十分相似，因此如果文學作品中出現這樣的語境，譯者便可藉由語言替換的翻譯方法進行翻譯，讓讀者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是文中角色想要「拉近」他我關係的感覺。

此外，還有一種情緒罵詞，是指發話者因意外受傷或受辱而在發洩情緒時脫口而出的罵詞（韋津利，2004 / 2006，頁 49）。這類罵詞通常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並常常是在極端情緒狀態下的自然反應。在臺灣現代主義小說中便常見情緒罵詞的使用，比如《臺北人》中提到：「有時宋太太輸急了，也顧不得身份，就抓起兩顆骰子啐道：『呸！呸！呸！勿要面孔的東西，看你楣到啥個辰光！』」（白先勇，2002，頁 59），在中文語境下，此處的「呸！

呸！呸！」就是情緒罵詞，山口守把「呸！呸！呸！」譯成「クソツツ！クソツツ！クソツツ！」（白先勇，1971 / 2008，頁 14），採用的是語言轉換的翻譯方法，將有對等功能的日語罵詞「クソツツ！」作為中文情緒罵詞的替代詞。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看，當原文形象不能保留在譯文中，又不能換用日語形象性詞語時，譯者大多只能屈就地採用非形象性的詞語來翻譯原文形象性詞語的含義。

例如，「クソツツ」一詞既可寫成漢字「糞」，也可表達為漢字的「屎」（KUSO），在日語語境下，說話者（作者）為了表達強烈的情緒感，有時會在該詞後加上促音來強調語氣。日文中具有相同功能的情緒罵詞還有「なにくそ」、「えいくそ」等以複合語形式出現的罵詞，而「糞親父」、「糞真面目」、「糞熱い」等以接頭詞形式連接名詞出現的罵詈語型態也十分常見（奧山益朗，2017，頁 94—95）。

一如前述，在中文語境下，由於方言詈語種數眾多，作者可以基於其想形塑的文學情境，從方言俗語或各種罵詞中揀選一用，比如《臺北人》中就常用外省罵詞「娘個冬采」來表達角色的情緒不滿。例如：「娘個冬采！金大班走進化粧室，把手皮包豁啣一聲摔到了化妝檯上，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妝鏡前，狠狠的啐了一口」（白先勇，2002，頁 117）。「娘個冬采」是金大班解恨抒情時發出的啐嘴詞，並非針對某個特定對象意圖攻訐所發出的粗話。山口守以「クソツタレ！」來翻譯「娘個冬采！」（白先勇，1971 / 2008，頁 69），就字數對稱和文學形式而言，日文語境下的「クソツタレ！」十分接近中文語境下「娘個冬采」予人的文學意象。但原文中的形象性就難以同時表現出來，譯本雖然沒有原文那麼靈活生動，但也算處理得當，簡潔有力地表達出原作的文學情境。

日本江戶時代以降，「クソツタレ！」就常被用作罵詞，奧山益朗（2017）也曾指出，這個詞是少數現代日文中還留存下來的辱罵詞。回頭來看，無論是「呸！」還是「娘個冬采！」，山口守都以「クソツタレ！」加以翻譯，由於中日文化情境使用這些罵詞的文學情境相近，因此無論是中文讀者還是

日文讀者，應該都能明白作者在此處所要傳達的訊息。

相較之下，在「這批新人！這批小野種子！是很有良心的嗎？」（白先勇，2002，頁303）的詞句中，山口守則是把羞辱性極強的貶低語「小野種子」譯成「青二才の小僧どもめが」（白先勇，1971／2008，頁248）。「青二才」一詞是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日文罵語，類似中文俗話說的「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年輕小夥，而在「青二才」後面再加上「小僧」這個鄙視語，兩相疊加之後，在日本語境裡會呈現出加倍侮辱和貶低對方的文學效果。然而，山口守把金大班的「方言詈語」置換成江戶方言，不知日本讀者是否能感受到翻譯文學中的「陌生感」（defamiliarization），還是會誤把《臺北人》中的角色都與「江戶男兒」（江戶子）的意象相連？這種涉及說話者性別及使用到帶有地區方言或歷史感的罵詞的地方，實際上對譯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由於「咒罵關乎權力，而一般說來男人握有較多權力」（韋津利，2004／2006，頁183），因此「性隱喻」常被作家用來凸顯男女權力不對等的文學情節。白先勇的《臺北人》中許多詈辱語，如「野種」、「王八羔子」、「幹你老母雞歪」、「媽的」、「野女人」、「死丫頭」、「孽種」、「婊子」、「幹伊娘」、「娼婦」、「娘個冬采」、「婆娘」、「龜兒子」、「偏他娘的」、「癩三」等，都是帶有性隱喻的中文罵詞。相較之下，山口守的日譯本中在處理這些帶有性隱喻的罵詞時，卻沒有使用太多的日文性語罵詞，使得山口守的翻譯版給人較原著「平淡」的感覺。換言之，白先勇筆下《臺北人》裡鮮活的罵語文化未被客觀傳達出來。

關於罵詈語和詈辱語的規範，在翻譯文學作品時也須特別留意。惡言相向、咒詛詈辱、發洩情緒，這些都是人們使用咒罵詞最主要的目的。由於罵詈語和詈辱語有程度不一的傷害性，因此某些國家或地區有明確的限制和法律規範。比如美國報刊對使用髒話一直保持嚴格標準，只有在特定情況如報導公眾人物或在描述邊緣群體的故事的真實性（Pressman, 2020）時才會出現偏離，日本當代也有歧視語言的使用禁令，²而臺灣法院對公然辱罵者也有判

² 如〈仇恨言論消除法〉、〈反歧視法〉等。

刑罰款的案例。因此，翻譯固然要講究所謂的「忠實原則」，但譯者還是必須考量目標語社會適用的法律、民情，必須在合理的翻譯尺度內避免譯出過分歧視、汙辱與挑釁的語彙。

這也意謂翻譯詈辱語時，限縮原則十分重要。在翻譯呈現的方法上，為了避免觸犯法律規定並維護倫理規範，譯者若想直譯罵詈語或詈辱語，就必須考慮降低罵詈語和詈辱語對目標語讀者帶來的衝擊性，常見的翻譯方法是應用符號化或諧音字，比如若要以英文寫出 (f**k) 和 (s**t)，譯者便可應用符號化的技巧，限縮這兩個常見罵詞對讀者帶來的衝擊。也有些方法是以加上「*」號和「X」號來隱匿上述詞彙的部分字母（韋津利，2004 / 2006）。

在中文方面也有利用諧音或「X的」等符號來限縮罵詞對讀者帶來衝擊的表達方式，既能兼顧語意表達的流暢性，也能為社會文化規範盡點維權之力。在中文語境下，也有作者會在表達罵詞「幹」時，轉用諧音「淦／看」等創詞來翻譯，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避免觸犯禁忌。

然而，在性語辱罵詞方面，日文不如中文多，那麼在無法進行中日文對譯時，日文譯者可如何處理？李喬（1997）《藍彩霞的春天》中有許多對白都出現「幹咧」（頁 82）、「幹」（頁 84）、「幹啦」（頁 88）、「幹妳」（頁 110）、「幹汝老母」（頁 231）等罵詈語和詈辱語，這些話語直接觸犯了華人社會的血統禁忌，都是屬於有強大汙辱力的罵詞，是中產階級避之惟恐不及的禁忌詞；但在《藍彩霞的春天》中，這些罵詈語和詈辱語因有文學意圖，所以被頻繁地使用在各處對白之內，藉以突顯雛妓圈內備受語言霸凌的生態。這裡便會出現一個翻譯上的挑戰，亦即譯者該如何既兼顧目標語讀者的理解需求，同時又遵守目標語社會的出版法規來進行翻譯？

明田川聰士對於上述的罵詞，在李喬（1985 / 2018）《藍彩霞の春》中使用的日語粗話包括了「クソッ」（頁 99、111）、「やる」（頁 101）、「クソッ！」（頁 105）等。與山口守在《台北人》中的選詞一樣，都是採取容易理解且符合情緒情境的日語既有詞來替代中文中的粗話；對於動詞「幹」，

明田川聰士以「やる」、「やられる」（頁 84）翻譯；「打砲」則在句法上做了異動，被譯成「やられる」（頁 101）；特殊的性語「大鍋炒」（李喬，1997，頁 124）一詞，則是以音譯未加註的方式處理，並在日文漢字「大鍋炒」的旁邊加上中文標音「タクオチャオ」（李喬，1985 / 2018，頁 143）；「破身」（李喬，1997，頁 234）這個具有性暗示的詞彙，則被翻成較為艱澀的名詞型態：「処女喪失」（李喬，1985 / 2018，頁 257）。綜上，我們可以歸結出明田川聰士對於罵詈語和性語類辱詞的翻譯技法如下：大多採用符合目標語文化情境下，讀者可以理解的直譯手法翻譯，而對獨特的性語如「大鍋炒」等字，則保留了大鍋炒的漢字，讓日譯本呈現出新奇文字的「陌生感」，並在該字旁加上標音，為目標語讀者帶來更多的「異國情調」。

除此之外，李喬（1997）《藍彩霞的春天》中還有其他貶低女性的詈辱詞，如「賤貨」（頁 67）、「王八蛋」（頁 232）、「落翅仔」（頁 235），這些貶抑詞分別在李喬（1985 / 2018）《藍彩霞の春》中被翻譯成「くず」（頁 84）、「馬鹿野郎たち」（頁 255）、「ラオシラー（売春婦）」（頁 259）。日文的「くず」漢字寫作「屑」，意指沒有用的、毫無價值的東西，在日本的文化語境下，罵人「くず」就等同視對方為廢物、沒用的東西（奧山益朗，2017，頁 94）。在貶低人的詈辱語上，中日語都會用「賤」、「屑」等詞來形容階級低下的人事物，兩者在語意上沒有顯著差異；而閩南語的「落翅仔」則指進行非法性交易的學齡女子（落翼仔，2023），但日譯本的對譯詞「ラオシラー」（売春婦）的翻譯方法，雖呈現了閩南語音譯及其語意，為作品增添了「異國情調」，但「落翅仔」中「學齡女子」的意涵沒有翻出來。此外，「落翅仔」是以閩南語標記，前面提到的「大鍋炒」則以中文語音標記，且「大鍋炒」後方也沒有用括號註的方式說明該詞是「雜交」之意。除此之外，明田川聰士對其他的詈辱語，如把「下賤」（李喬，1997，頁 280）譯為「最低」（李喬，1985 / 2018，頁 306）或「卑劣」（李喬，1985 / 2018，頁 307），也是用了同詞多譯的翻譯方法。關於明田川聰士在辱罵語的譯詞上沒有統一用字的翻譯現象，雖然不符合特定詞應統一譯詞的原則，但卻讓原本

罵詈語不多的日譯本多了一些變化。

中文中用來汗辱對方的詞彙往往與「性」、「階級」或「爬蟲類」有關，並常以「高大上」的反義詞：「矮小下」（即矮化、壓制、貶低）等方式來辱罵對方，同時也會連用這些粗鄙語強化汗辱的力道，比如龜兒子等於「龜」加「兒子」、小婊子等於「小」加「婊子」、山地野女人等於「山地」加「野」加「女人」。日文雖然也會使用「動物」來辱罵對方，但很少用「龜」來罵人，因為烏龜的意象在日本文化中象徵長壽，沒有龜縮之意。由於中日罵語文化中在「龜」的理解上不盡相同，也就無法直譯；而日文常用的「動物」罵詞，則常見「畜生」或是加重汗辱的「畜生」加「奴」等型態。

韋津利（2004／2006）指出，「日本人最常用也最強烈的咒罵詞是ばか」（頁267），「ばか」的漢字寫作「馬鹿」，用來罵人愚蠢或愚笨，雖然漢字有馬有鹿，但這個詞卻與馬、鹿毫不相關。根據奧山益朗（2017）的研究，「バカ」語源來自梵語的“moha”，是關東地區較為常見的辱罵語，這是從日本中世之後就經常使用的罵詞，無論是二葉亭四迷的《浮雲》（浮雲）還是曾野綾子的《砂糖菓子壞掉時》（砂糖菓子が壊れるとき），日本文學家的作品中不乏使用這個辱罵語的蹤跡（頁246—248）。不過，值得注意的是「ばか＝馬鹿」這個詞，「在英語中相當溫和，完全傳達不出其語用的力量」（韋津利，2004／2006，頁267），在中文語境中也有相同的弱化情況。

由於日本社會在工業革命之後，日本人就因崇尚進步事物而對舊傳統的態度轉為輕蔑，其集體潛意識中存在著對舊思維的排斥，認為舊思維等於蠢笨，這也導致「ばか」也成為日本人最易脫口而出、對守舊者最常使用的罵詞，用來辱罵對方無腦、無能、低智商（韋津利，2004／2006，頁267—268）。「馬鹿野郎＝ばかやろう」也是辱罵對方愚笨的詈辱語，雖然日文中的「野郎＝やろう」是對男性的辱罵語，但是現在的日本社會也會用在咒罵女性（奧山益朗，2017）。「馬鹿＝ばか」和「馬鹿野郎＝ばかやろう」除了會用在「惡意咒罵」上，也同時具有「社交功能」或「情緒功能」，惡意

的程度可從上下文脈判斷。「ばかやろう」也就成為日文中最常用的辱罵語之一。有人或許認為，日文翻譯普遍難以再現中文原著中粗鄙語所營造的文學氛圍，但從跨文化翻譯的角度分析，在日文語境下，應可了解即便譯者是以「ばかやろう」或「クソツツ」等翻譯「幹伊娘」、「呸！」、「娘個冬采」，對日本讀者來說也都是令人厭惡、讓人感到違和的咒罵情境。

表 1

山口守在翻譯中文辱罵語時，並未保持一貫用語，大多以「ばかやろう」或「クソツツ」等翻譯

中文罵詈語	日語翻譯	備註
呸！呸！呸！	クソツ、クソツ、クソツ！	以「糞」替代令人厭惡的咒罵詞
幹伊娘	ばかやろう クソツタレ！	以「糞」、「蠢」對等粗鄙語替代令人厭惡的咒罵詞
娘個冬采	クソツタレ！ ばかやろう 馬鹿じゃないの	以「糞」、「蠢」對等粗鄙語替代令人厭惡的咒罵詞

在貶低女性的詈辱語方面，《藍彩霞的春天》中「臭查某」（李喬，1997，頁 37、76）一詞反覆出現，明田川聰士以幾種日本常見的粗鄙語表達法來替代，如在名詞前面加上「屎」，如「屎ガキ」（李喬，1985 / 2018，頁 53）或加長罵詞長度，如「この野郎」（李喬，1985 / 2018，頁 93）。誠如前述，在日文罵詈雜言語中，「糞／屎」作為名詞的接頭語時，具有貶低、侮辱對方的意思（奧山益朗，2017，頁 94）。日文常使用這種讓人「感覺骯髒」的詞彙罵人，而「臭查某」的「臭」與日文「糞／屎」給人髒汙的印象相近，因此翻譯時以相似氛圍的詞彙來替代頗為貼切，也讓讀者容易理解。不過，日文的「この野郎」（李喬，1985 / 2018，頁 93）一詞，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被用於辱罵或蔑視男性對象的場景上，但《藍彩霞的春天》日譯版卻大

多用在辱罵女性的場景。《藍彩霞的春天》旨在描寫受迫的弱者／雛妓，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作品中的買春男或皮條客等常用「臭查某」這個詈辱語來罵雛妓。日譯本使用「野郎」來翻譯「臭查某」雖讓人頗感唐突，但反觀日本，現實生活中也有以「馬鹿野郎」辱罵女性的情況（奧山益朗，2017，頁248）。其他辱罵女性的詞語還有「狷查某」（李喬，1997，頁37）譯為「この野郎」（李喬，1985／2018，頁53）、「死查某」（李喬，1997，頁95）譯為「ガキの野郎」（李喬，1985／2018，頁112）等，這些詞彙在日文版中也多是以「野郎」處理。而另外一個用在辱罵女性的「臭雞歪」（李喬，1997，頁280）一詞，在《藍彩霞的春天》日譯本中則沒有以換喻表現或選擇對等詞的方法譯出，明田川聰士以較為隱晦的方式處理成「自分の店の人と寝てるんだよ」（李喬，1985／2018，頁307）。句中的「自分の店の人」是指「店裡的人」，而這裡的「人」指的就是原作中的罵詞「臭雞歪」。日文語法因詞語之間有連續關係，聽話者常能從上下文便知道某些範疇詞的指示語意。這種翻譯方法就如前面提及過的，譯者在處理詈辱語時，也可應用日語內部語言系統的邏輯性來因應，以代詞「人」表達臭雞歪，雖弱化了原著中強烈的貶抑性與汗辱性，但也適度調節了該詞對讀者帶來的強烈衝擊。

表 2

明田川聰士翻譯針對女性的中文詈辱語的情況

中文詈辱語	日文翻譯	說明
臭查某	野郎	用於辱罵女性，感覺較唐突
臭查某	屎ガキ	用於辱罵女性，在名詞前面加上「屎」，感覺較唐突
	この野郎	用於辱罵女性，加長罵詞長度，感覺較唐突
狷查某	この野郎	用於辱罵女性，以「野郎」處理
死查某	ガキの野郎	用於辱罵女性，以「野郎」處理

(續下頁)

表 2

明田川聰士翻譯針對女性的中文詈辱語的情況（續）

中文詈辱語	日文翻譯	說明
臭雞歪（你敢開自家店裡的臭雞歪）	自分の店の人と寝てるんだよ	隱晦處理，未直接翻譯辱罵語
幹伊娘	ばかやろう クソッタレ！	較為平淡的翻譯，考慮讀者接受度
開包	御開帳	以文化挪用和語境轉換的方式處理，語義不同
開苞錢	未譯	開苞錢的「開苞」未譯出，日文只有翻出「金を払った」
免開包	やらない	皆做動詞，詞性相符，語義相近
被開包的（是伊所屬於的肉體）	遊ばれたり	指被玩弄的肉體，以不同動詞表達相近的語意

註：譯者在翻譯這些詈辱語時，既考慮了原文的文化背景，也考慮了目標語言的文化和社會規範。特別是在處理具挑戰性的詞彙時，譯者採取了更隱晦或較輕描淡寫的翻譯策略。

雖然中文與日文的咒罵模式差異很大，但兩種語言都會利用串接性的辱罵語來強化其咒詛或咒罵的意圖。日語咒罵語中最主要的模式是以排泄物「糞」與貶低詞「ばか」、「奴」、「野郎」來表達惡意，這些詞彙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連用，以達到加乘咒罵的效果，例如「糞+野郎+め」就是三倍的咒罵語，既有汗巖對方、辱罵對方，也有貶低對方的洩憤作用，在日文語境下，其咒詛或辱罵的力量不亞於《臺北人》中「幹你老母+雞歪」或《藍彩霞的春天》中「臭雞歪」這樣的辱罵效果。

韋津利（2004／2006）指出，咒罵詞要為人接受並產生效果，就需要符合以下若干條件：必須要「有冒犯性」、需要「特定性」、必須「觸犯禁忌」、必須「有意造成聽者的震驚或憤怒或不自在」、必須「實際存在」、必須是「眾人廣泛同意為黏溼噁心的東西」等（頁 248—249），而日本人相信語言具有力量，因此有「言靈」（コトダマ）的說法，基於日本人認為字詞和拳頭一

樣都可傷人，口語暴力是相對於肢體暴力的另類暴力，因此以日本人認得的辱罵詞替代中文語境中的辱罵詞，也能讓日語讀者在日語語境下感受到汗辱性。山口守以「ばかやろう」（白先勇，1971 / 2008，頁141）翻譯「幹伊娘」的作法，或許有人覺得平淡無奇，沒有將生動的《臺北人》中的文學情境好好地表達出來，但這更多是受到潛在讀者設定、目標語文化約制，以及法律和社會規範的影響。

在《藍彩霞的春天》中，李喬時常使用到「開包」一詞。所謂的「開包」／「開苞」，就字面而言，是指打開包裹或袋子，而在臺灣俚語裡，則指女性遭遇初次性行為，也就是「破處」，即失去處女之身（開包，2024）。誠如前述，「開包」一詞是帶有明顯物化和貶低女性意味的詞語，特別常見於涉及未成年或性交易的語境之中，帶有強烈物化女性和性剝削的意味。即使「開包」雖非罵詈語，但在閩南語中，卻常用於雛妓文化之中，是帶有性歧視的詈辱語。「開包」在描寫雛妓世界的《藍彩霞的春天》中時作動詞時作名詞，而日譯本在「開苞」作為「名詞」時，譯者最初是以「御開帳」（李喬，1985 / 2018，頁71）一詞翻譯。如「就是『開苞』啦。有錢大爺，花三萬五萬，甚至十萬八萬，找一個在室女開……」（李喬，1997，頁55），譯文：「つまり『御開帳』ってこと。金のある大爺が、三万や五万、酷いのになると八万とか十万とか使って、在室女を探すのよ……」（李喬，1985 / 2018，頁71）。

日文的「御開帳」原是宗教用語，是指某種日本的宗教儀典，「開帳」意指寺院在特定日子公開展示平時收藏於神龕中的佛像，讓信眾能在「御開帳」期間，親眼看見並膜拜，參與「御開帳」是信眾展現「虔敬」之情的表現。然而，根據永井義男（2021）的研究資料，³日本傳統的「御開帳」在時間的推移下，不知何時，此一詞語成了「女性張開雙腿露出私處」的意思，進而「御

³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資料。

開帳」也意味著女性的生殖器。在日本戲作《浮世風呂》、⁴《娘消息》中，⁵都曾被戲謔地用作女性陰部。中譯日時，譯者採用了語言挪用及語境轉換的修辭手法，將臺灣俚語「開包」的意涵，以「御開帳」的換喻手法加以表達。由上可知，細究之下，將「開包」譯為「御開帳」雖觸及性隱喻的修辭技法，但在實際語意上卻仍有所不同。

誠如前述，日本文化並不把「性」與「道德」的問題兩相綁定，日本文化認為性本身並不邪惡，因此譯者如果將中文的「屌=プッシー、あそこ、にゃあにゃ」、「幹伊娘=ガン・イ・ニアン」直譯成日文，是無法再現如原文般的汗辱效果的。臺灣常見的侵略性罵詞，包括以性活動、性器官以及侮辱對方母親或性別的貶抑詞，如白先勇（2002）《臺北人》中就可以找到的「幹伊娘」（頁194、197）、「幹你老母雞歪」（頁214）、「偏他娘的」（頁72、126、130）、「媽的」（頁108）、「娘個冬采」（頁117）、「婆娘」（頁207、213、214、219）、「婊子」（頁124、126、184、196）、「小娼婦」（頁123、126、128）、「小妖婦」（頁236）等；或汗辱對方血統的詈辱語，如「孽種」（頁126、127）、「王八」（頁125、126）、「王八蛋」（頁106）、「老龜公」（頁188）、「龜兒子」（頁105）、「小王八羔子」（頁301、302）、「小野種子」（頁303）等各種涉及挑釁血統主義的罵詞。此外，還有咒罵對方應該遭到天譴或死傷懲罰的詛咒語，如「天殺的」（頁159）、「挨刀的」（頁203）；或是嘲笑對方身分或看輕對方不文明或無知識能力的「山地野女人」（頁104）、「野雞」（頁196）、「野種」（頁126）、「刁婦」（頁122）等等的詈辱語。

⁴ 戲作《浮世風呂》為式亭三馬所著，根據永井義男（2021）的摘錄，內容描寫一段女僕結伴到浴場的情景。其中一人在濕滑的地板上仰面摔倒，同行的女僕們紛紛說道：「真危險，哎呀，一定很痛吧（おお、危ねえ。やれやれ、痛かったろう）」（第8段）、「哎呀，好危險，御開帳，南無阿彌陀佛（おっと、危なし。お開帳、なんまみだぶつ）」（第8段）。這裡的「御開帳」意味女性陰部。此處描寫女僕摔倒時雙腿張開，陰部露出，女僕們將此情景比喻為平時隱密的佛像開帳了，因此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對白意圖呈現戲作想要表達的輕慢猥褻之趣味。

⁵ 戲作《娘消息》則為三文舍自樂所著，描寫曾經相戀但許久未見的男女之久別重逢。是時，男方向女方索求身體，對女方說道：「好想參拜。這本尊的御開帳（ご用ざんす、拝みんす。本尊さまのお開帳よ）」（永井義男，2021，第14段）。此處的「本尊的御開帳」意味張開雙腿露出的陰部。以上的對白場景都是運用御開帳的原意和戲作想要呈現的輕妙猥褻的雙關語之情景。

山口守在處理白先勇（1971／2008）《台北人》中的辱罵詞和汗巖詞時，多用「輕描淡寫」的手法改作，比如他用「ああ」（頁72、77）取代「我的娘」、「偏他娘的」；以「くそつたれ」（頁69、145、101）或「ばかやろう」（頁141）取代「娘個冬采」、「幹伊娘」、「考背」，雖然也有使用一些較為直接的辱罵語如將「野種」、「小孽障」譯為「父なし子」（頁77、78），將「刁婦」譯為「あばずれ」（頁73），乍看之下都是罵詞，但仔細分辨還是有些不同。比如「小孽障」的「孽障」原是佛教用語，雖常被用於貶抑他人，但並沒有「野種」的意思，與「父なし子」還是略有不同，而在表達「小婊子」、「小娼婦」時，山口守也避免使用帶有貶抑性和侮辱性的「娼婦」或「ビッチ」（bitch）等詞彙，而是使用「若いダンサー」（頁70、75、77）來替代，從以上的譯例來看，山口守在翻譯的過程中，會考慮目標語讀者對於粗鄙語是否能夠接受來斟酌其翻譯用語的選擇。

表 3

《台北人》中文罵詈語及其在日語中的對應翻譯

中文罵詈語	日語翻譯	備註
幹伊娘	ガン・イ・ニアン	直譯但不再現汗辱效果
	ばかやろう	較為平淡的翻譯，考慮讀者接受度
	クソツタレ！	較為平淡的翻譯，考慮讀者接受度
考背	くそつたれ	詈辱語，語意不同
幹你老母雞歪	このくそ野郎	以加長詞串的翻譯技法強調汗辱效果
偏他娘的	ああ	輕描淡寫的手法
	略	未譯
	あいにく	詞性及語意轉化
我的娘	ああ	輕描淡寫的手法

(續下頁)

表 3

《臺北人》中文罵詈語及其在日語中的對應翻譯（續）

中文罵詈語	日語翻譯	備註
媽的	ちきしょう	以長詞串的平假名翻譯技法強調汗辱效果
娘個冬采	クソツタレ！	以日語常見的「糞」、「蠢」對等粗鄙語替代令人厭惡的咒罵詞
	ばかやろう	以日語常見的「糞」、「蠢」對等粗鄙語替代令人厭惡的咒罵詞
	馬鹿じゃないの	以日語常見的「糞」、「蠢」對等粗鄙語替代令人厭惡的咒罵詞
屌	ブッシー	直譯但不再現汗辱效果
	あそこ	直譯但不再現汗辱效果
	にゃあにゃ	直譯但不再現汗辱效果
死婆娘	あの女	各種婆娘如湖北婆娘、臺灣婆、湖北婆、洗衣婆，都以「~の女」翻譯，無法特別強調出中文語境下婆娘一語的輕視感
小婊子	若いダンサー	避免使用帶有貶抑性的詞彙
婊子	女	日文以對等詞直譯，但此譯法未能再現中文語尾加上「子」的詞串所代表的汗辱效果
小妖婦	奸婦め	在語尾加上「め」強調負向歧視感
小娼婦	若いダンサー	避免使用帶有貶抑性的詞彙
	あの子達	看不出貶抑意味
刁婦	あばずれ	直譯但可能有意義上的差異
小孽種	子供	看不出貶抑意味
小王八	青二才	與中文的貶抑程度略有差異

（續下頁）

表 3

《臺北人》中文罵詈語及其在日語中的對應翻譯（續）

中文罵詈語	日語翻譯	備註
王八蛋	くそ野郎め	日語語尾以負向表達「め」強調貶抑意味
老龜公	例の老いぼれ龜こと	龜公是指妓院中幹雜役的男性，老龜公是指熟於妓院事務的男性，與年老不一定有關係，日語譯詞語義有異
龜兒子	野郎	缺少侮辱性的貶抑語義
小王八羔子	ああいいう青二才の馬鹿者	以長詞串強調汗辱效果
天殺的	罰当たり	語義略同但指示內容略有不同
挨刀的	太刀を浴びせる	詞類改變且語義有異
山地野女人	山地の女	「野」女人的「野」在詞串中的貶低性於日文譯詞中未被強調
野雞	売春婦	「野」雞是指妓女，但「野」在詞串中的貶低性於日文譯詞中未被強調
野種	父なし子	詈辱語，「野」在詞串中的貶低性於日文譯詞中未被強調，使得語義略有差異
	青二才の小僧	以長詞串強調汗辱效果
小野種子	青二才の小僧どもめが	以長詞串強調汗辱效果
小孽障	父なし子	詈辱語，語義略有差異

註：山口守對《臺北人》詈辱語的翻譯選詞，傾向考慮目標語讀者是否能夠接受日譯詞的粗鄙程度，但若從語義對等或文化適應的角度來看，則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肆、結語

本研究以《臺北人》和《藍彩霞的春天》作為研究文本，梳理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相關文獻，深入探討這些語言現象在中日不同文化和語言中的特點，並進一步探討其在翻譯文學作品時所面臨的挑戰及可行的翻譯策略與應用。

本研究強調譯者可從中日文語境的拆分著手，作為翻譯辱罵語時的依循原則。

在華人社會中，方言詈語尤其與血脈關係緊密相連。我們可從白先勇的《臺北人》和李喬的《藍彩霞的春天》等作品中一窺究竟。然而，日文語境中缺乏相等的罵詞文化，因此譯者必須採用語言轉換或情境重造等方式來因應。本文也討論了日文中敬語的使用和罵詈語的含蓄表達方式，以及中文與日文兩種不同文化對詈辱語接受度的差異及相應的翻譯策略。此外，透過前面的文本比較分析可知，中日的詈辱語在性和排泄物的使用上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日本文化中性語不帶汙名，而中文則常用性語作為詈辱用語。

在翻譯方面，日文譯者面臨如何在跨文化背景下傳達與中文原作相同的辱罵氛圍的挑戰。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考慮目標語言的文化規範和法律限制。翻譯方法上可採用符號化、諧音字或替代詞來降低原文中罵詈語對日本讀者的衝擊，這可能會造成譯本的文學氛圍或衝擊張力難以與原著匹敵。此外，本研究也指出了中日文化間的罵詈語形式和思維存在顯著差異，譯者需運用翻譯技巧創造與原文相似的罵詈語境，達到跨文化翻譯的等效性。因此，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翻譯不宜僅依賴「忠實原則」，還需考慮文化、語言和社會規範。

本研究透過對《臺北人》和《藍彩霞的春天》日譯本的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翻譯分析，探討了跨文化語境下辱罵語翻譯的效果和限制。由於目標語社會的法律規範和文化差異，譯者需要採取適當的「改寫」方法來重現原文的辱罵效果。文化翻譯學派的觀點有助譯者運用創意和換詞等技法來達成跨文化溝通的目的，藉此跨越源語言與目標語言在辱罵語系統上不對等的翻譯挑戰。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日譯本常常使用「クソ」等詞彙來取代原文中出現的罵詈語和詈辱語，由於日本文化鮮少將性語當作罵詞，日譯本通常會透過創詞標音、創詞加注等方式來因應。為了在譯本中呈現罵詈語和詈辱語的「異國情調」，譯者有時會採用音譯、創詞或替代詞等翻譯手法。然而，譯者個人的翻譯態度、目標語社會的法律規範，以及譯者預設的潛在讀者、翻譯專

案的發起人的思維等多種因素，仍會影響最終作品的呈現。在跨文化語境中，譯者在翻譯罵詈語和詈辱語時面臨諸多限制，譯者可用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是從理解原著出發，進而運用翻譯技巧和目標語文化中類似的情境詞彙來進行語言轉換，以實現異文化語境的仿造，解決目標語詞庫中罵詞欠額的問題，進而實踐跨文化溝通的目的，達到文學傳播的效果。

本研究從實證分析著手，跳脫單純的文義解釋與詞彙對比，從文化翻譯學派與社會語言功能等角度，討論了罵詈語和詈辱語在文學翻譯中的角色和策略，凸顯了罵詈語和詈辱語在不同文化中的多樣性及其在文學作品中的多重功能，也強調在跨文化翻譯中，譯者應處理具有文化特定意義的語言元素，尊重原作運用辱罵語的文學意圖，並斟酌目標語讀者在辱罵詞方面的接受度。透過這些翻譯策略與原則的依循和執行，譯者應能更好地傳達原文的文學氛圍和情感，透過譯本的生產來豐富讀者的閱讀體驗。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王文興（1981）。《背海的人》。洪範。

【Wang, W. X. (1981). *Backed against the sea*. Hung Fan.】

白先勇（2002）。《臺北人》。爾雅。

【Bai, H. Y. (2002). *Taipei people*. Erya.】

李昂（1983）。《殺夫》。聯經。

【Li, A. (1983). *The butcher's wife*. Linking.】

李喬（1997）。《藍彩霞的春天》。遠景。

【Li, Q. (1997). *The spring of Lan Caixia*. Yuanjing.】

韋津利（Wajnryb, R.）（2006）。《髒話文化史》（顏韻譯）。麥田。（原著出版年：2004）

【Wajnryb, R. (2006). *Language most foul* (Y. Yen, Trans.). Wheatfie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張誦聖（2015）。《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聯經。

【Zhang, S. S. (2015). *Modernism, contemporary Taiwan: The trajectory of literary paradigms*. Linking.】

許鈞（2012）。《文學翻譯批評研究》（增訂本）。譯林。

【Xu, J. (2012).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Rev. ed.). Yilin.】

開包（2024年6月30日）。漢典。<https://www.zdic.net/hant/%E9%96%8B%E5%8C%85>

【Kaibao. (2024, June 30). *Free Online Chinese Dictionary (ZDIC)*. <https://www.zdic.net/hant/%E9%96%8B%E5%8C%85>】

落翼仔（2023年6月24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9969/>

【Luoyizi. (2023, June 24). *Dictionary of Frequently-Used Taiwan Minnan*. <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9969/>】

日文文獻

奥山益朗（2017）（編）。《罵詈雑言辞典》（新装版）。東京堂。

【Okuyama, M. (Ed.). (2017). *Abusive language dictionary* (New ed.). Tokyodo.】

真田信治、友定賢治（編）（2011）。《県別罵詈雑言辞典》。東京堂。

【Sanada, S., & Tomosada, K. (Eds.). (2011). *Dictionary of abusive language by prefecture*. Tokyodo.】

中島利一郎（1967）。《卑語の起源》。雄山閣。

【Nagashima, L. (1967). *Origin of vulgar words*. Yuzankaku.】

永井義男（2021年11月24日）。〈【江戸の性語辞典】現代でもおなじみの言葉「お開帳」は江戸時代からあった〉。歴史人。<https://www.rekishijin.com/15530>

【Nagai, Y. (2021, November 24). (*Edo sexual terminology dictionary*) *The word “Okaicho” that is still familiar today has existed since the Edo period*. *Rekishijin*. <https://www.rekishijin.com/15530>】

白先勇（2008）。《台北人》（山口守譯）。國書刊行會。（原著出版年：1971）

【Bai, H. Y. (2008). *Taipei people* (M. Yamaguchi, Trans.). Kokushokankoka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1)】

李喬（2018）。《藍彩霞の春》（明田川聰士譯）。未知谷。（原著出版年：1985）

【Li, Q. (2018). *The spring of Lan Caixia* (A. Satoshi, Trans.). Michitan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英文文獻

- Andersson, L. G., & Trudgill, P. (1990). *Bad language*. Penguin.
- Bączkowska, A., & Gromann, D. (2023). From knobhead to sex goddess: Swear words in English subtitles, their fun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 as linguistic linked data. *Rasprave: Časopis Instituta za Hrvatski Jezik i Jezikoslovlje*, 49(1), 79-97. <https://doi.org/10.31724/rihjj.49.1.4>
- Bassnett, S. (1980).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 Berman, A. (2000).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L. Venuti, Tran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285-297).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shamdar, M., & Rafi, F. (2018). Social identity and use of taboo words in angry mood: A gender stud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8(6), 623-628. <https://doi.org/10.17507/tpls.0806.11>
- Holgate, E., Cachola, I., Preoțiuc-Pietro, D., & Li, J. (2018). Why swear? Analyzing and inferring the intentions of vulgar expressions. In E. Riloff, D. Chiang, J. Hockenmaier, & J. Tsuji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pp. 4405-4414).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ttps://doi.org/10.18653/v1/D18-1471>
- Holmes, J., Stubbe, M., Vine, B., & Mara, M. (1996). *Language in the workplace*. Victoria University. <https://www.wgtn.ac.nz/lals/centres-and-institutes/language-in-the-workplace/docs/ops/OP-12.pdf>
- Hughes, G. (1988). *Words in tim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Blackwell.
- Kidman, A. (1993). *How to do things with four-letter words: A study of the semantics of swearing in Australia* [Bachelor of Art Honou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GUSWORLD. <https://www.gusworld.com.au/nrc/thesis/intro.htm>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Montagu, A. (2001). *The anatomy of sweari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Ningrum, E. E., Netra, I. M., & Rajeg, G. (2022). Swearing expressions by main male and female characters in night school movie. *Udayan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5(2), 77-80. <https://doi.org/10.24843/UJoSSH.2021.v05.i02.p04>

Pressman, M. (2020). “Guttural phrases” and “vulgar directives”: The evolution of press standards on profanity. *American Journalism*, 37(2), 191-215. <https://doi.org/10.1080/08821127.2020.1750885>

Seward, J. (1992). *The Japanese*. Passport.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 John Benjamins.

Venuti, L. (2008).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俄文文獻

Markina, L. (2020). ГЕНДЕРНЫЕ СТЕРЕОТИПЫ МАСКУЛИННОСТИ В ДИАЛЕКТ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БРАННЫХ НОМИНАЦИЙ МУЖЧИН) [Gender stereotypes of masculinity in dialec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material of men’s expletive nominations)]. *Neophilology*, 6(21), 5-14. <https://doi.org/10.20310/2587-6953-2020-6-21-5-14>

烏克蘭文文獻

Skliar, O. (2020). КАТЕГОРІЯ ІНВЕКТИВНОСТІ: ВІД ВИТОКІВ ДО ВИКЛИКІВ СУЧАСНОСТІ [The category of invectiveness: From origins to the modern challenges]. *Studia Philologica*, 2(15), 43-53. <https://doi.org/10.28925/2311-2425.2021.156>